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错位：

后冷战时代的
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

吕新雨 著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错位： 后冷战时代的 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

吕新雨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吕新雨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7883-8

I. ①错… II. ①吕…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7782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

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叙述与视觉政治

主 编 赵月枝 吕新雨

著 者 吕新雨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883-8/G·11215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日本昭和十二年名古屋泛太平洋和平博览会赏牌

“批判传播学”编委

丛书总顾问：童兵

丛书编委（排名不分先后，以中文首字笔划为序）：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

冯建三

吉列尔莫·马斯特里尼（Guillermo Mastrini，阿根廷）

孙皖宁（澳大利亚）

邱林川

林春（英）

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美国）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英国）

胡正荣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

特里斯当·马特拉（Tristan Mattelart，法国）

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斯洛文尼亚）

童世骏

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华东师范大学 - 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资助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

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2013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纪念中国全面反法西斯战争 80 周年(1937—2017)

上篇 “美术”作为中国的世界史

1937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

——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①

引言

2016年8月,以“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为标题,苏州美术馆主办的“首届苏州文献展”在苏州美术馆、苏州丝绸博物馆、颜文樾纪念馆、吴作人艺术馆、朴园、双塔等地同时开幕,试图展开一种以苏州为视点的世界历史叙述。对笔者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向1937年“吴中文献展”致敬,这既是此次“文献展”名称的来源,也使得1937年的历史底片在今天得以显影。

从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到2016的“苏州文献展”,多重时间的曝光——时间的断裂、重叠和接续,光影摇曳,在历史文本中投下或明或暗的重重斑点。包括“吴中文献展”在内的30年代系列文献展,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发掘的历史记忆。某种意义上说,1937年的“吴中文献展”是对地方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大规模重新整理,这样一个总结性的姿态在20世纪战火威胁下出现,是一个极有意味的事件。作为一个“向后看”的举动,却是对时代的峻急回应。历史的火车在隆隆前行,车厢里看到的风景却不断后移,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出场的景观——一个前行与后退的视觉错位。

^① 本文节本发表于《开放时代》杂志2017年第5期,部分篇幅发表于《艺术百家》杂志2017年第5期。特致谢忱!

站在 2017 的门槛回望 1937, 新与旧叠印其中。历史的显影液下, 浮现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互相建构的时代底色。

(一) 30 年代文献展：“救亡”与“保守”的双重奏

“睹乔木而思故家, 考文献而爱旧邦”,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之篇首语录, 被征引为“吴中文献展”的宗旨。1937 年, 全面抗战在即, 张元济等整理国故的巨制《四部丛刊》(1919—1936) 在 1937 年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终止。稍早, 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 张元济耗尽心血开创的“亚洲第一图书馆”之东方图书馆, 包括宋、元、明、清版本珍本善本在内的 46 万册图书尽毁于日本战火。一起葬身火海的, 还有鲁迅翻译的附有苏联木刻版画的《铁流》梓版。这一无法弥补的文化浩劫, 成为一代文人的精神创伤。从“一二·八”到“八·一三”, 是 30 年代文献展无可回避的历史背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焚毁, 警醒与论证了文化与国运的关系。国破之际, 重整家当, 收拾旧文化、共赴国难, 自江南文化重镇开始, 势所必然。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吴中文献展主持人蒋吟秋在《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引言中疾呼: “盖金石器物, 动思古之幽情; 图像史传, 兴齐贤之景想。举凡会中所陈, 莫非先贤往哲精神之所寄托, 俱足令人奋勉淬砺, 发扬光大, 以扶持正气, 挽救民族。”^①以文献展的方式救亡图存, 现代意义上的国立图书馆、博物馆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吴中文献展并非孤立。之前有 1936 年的嘉兴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 1937 年的上海文献展览会、淮海文献展览会、漳州文献展览会、建瓯文献展览会以及察哈尔文献展览会, 1940 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等。^②另据冯天瑜回忆, 其父历史学家冯永轩 1942—1945 年在安徽学院任教期间, 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筹划举办文物展, 以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③ 均可列为此一波潮流之余脉。

^① 转引自孙迎庆, 《1937 年吴中文献展》, 《东方收藏》2014 年第 7 期, 第 115—116 页。

^② 周生杰, 《敬乡有道: 近代文献展览会》, 《光明日报》2011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574768.html>。

^③ 冯天瑜, 《“睹乔木而思故家, 考文献而爱旧邦”》, 《文汇报》2015 年 11 月 6 日, http://whb.news365.com.cn/xl/201511/t20151106_2281645.htm。

文献展体现国家意旨。浙江省教育厅下令省内各县举办文献展览会,并给予一定的资助,1936年11月1日—18日的浙江文献展与吴中文献展联袂举办,与此相关。前者的主导者是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历史学家陈训慈(陈布雷之弟),他在《浙江文献展览之旨趣》中申明“秉承浙江省教育厅之意旨”,并阐述了四大要点,分别是征集乡贤之著作、发扬浙江之学风、整理地方之文献、推进爱乡爱国之精神,最后一点是旨归:

爱乡爱国,其源一揆,表里相维,谊无偏废。浙人士素笃梓桑,亦唯吾浙人文之最有所系于民族之安危存亡。……清季革命之役,克奏肤功,亦多两浙英雋之舍身成仁,咸以文字鼓其成焉。此次展览,周爱咨询,间关征访,于此类有关表章往哲,道扬民气之文献,尤三致意,举凡革命先烈暨功在邦国之贤,尤尽力蒐求其遗传遗书遗物,区区微尚,岂第在表扬一省之人物,要期张此伟大磅礴之气,使浙人以至举国志士咸闻风而起耳。良以值兹国运方艰,外侮孔棘,此爱乡卫国之精神,自尤应发扬以广大之于全国,愿览者细察深省,以期知往策来之效,毋徒以朱墨纷披,存迷恋往古之感,蹈玩物丧志之讥也。^①

内忧外患之际,救文化于即坠,把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民族安危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叙述,以文化学术承前启后、救亡图存。陈训慈这一夫子自道,也预示了他在抗战之后,变卖家产、颠沛流离中舍身救护杭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宁波天一阁珍本善本古籍的后事。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陈训慈把现代公共图书馆作为开启民智之“教育文化的原动力”、“挽回民族劫运的主力军”。^② 其主导下的“浙江文献展”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浙江文献展展品 6000 余种,2 万多件,观众近 8 万人,盛况空前,也奠定了之后 30 年代“文献展”的基本格局。

正如柳诒徵在《浙江文献展览开幕致词》中的阐发:“时艰日棘,来轸

^① 陈训慈,《浙江文献展览之旨趣》,《图书展望》1936年第1期,第9—11页。

^② 吴忠良、王效良,《陈训慈与浙江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年第1期,第98—103页。

方遒，仆愿观斯会者，持吾言以为剑泉，益恢先哲之志量，兴我华夏，又我亚洲，则斯会之影响，岂徒域于一省一地已哉？”^①自此，这一模式迅疾在全国复制、延伸。顺便说一句，今天对文献展的重新发掘研究，大都定位在地方认同、市民认同的框架下，忽略的正是通过地方认同抵达民族认同的关键历史动因。国家危亡之际，地方认同只有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有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文化保守抵挡乱世之劫，文献展是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结合的一次重要突围。陈训慈界定的浙江文献展“举凡本省方志、乡贤著作、旧刻书版，既为蓄意蒐访，复以余力从事考撰宣传之役”，^②也正是1937年（1月20日—3月1日）吴中文献展遵循的模式。

很快，柳诒徵在《吴中文献展开幕词》中再次道白：

世乱虽亟，自圣哲视之，犹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日，而文教之孕育渐溉，俾斯人相安于中和懿永之境者，实宇宙之恒轨，非今日所宜视为缓图者也。^③

接踵而至的是1937年“上海文献展”（7月2日—11日），此时，距“八·一三”事变爆发只有一个月时间。据《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陈列品目录分为：典籍、书画及艺术品、金石、图像、乡贤遗物、史料等六部分，^④其模式与宗旨一以贯之，只是主事者由国立图书馆转为由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通志馆联合地方各界收藏家共同组织。上海文献展主席、老“党人”叶恭绰如此阐述：

此两年来，本位文化、自力更生诸种意义颇印入吾人之脑中，复因时局关系痛感史地研究之必要，而群众对总理遗教所屡屡昭示保存固有道德文化之说，亦多具深切之认识，故各地文献之展览亦应运而兴。浙江全省各区及江苏苏镇各属导其先路，成绩灿然，殆几有融

① 柳诒徵，《浙江文献展览开幕致词》，《国风月刊》第八卷，1936年第90期，第1页。

② 陈训慈，《浙江文献展览之旨趣》，《图书展望》1936年第1期，第9—11页。

③ 转引自孙迎庆，《1937年吴中文献展》，《东方收藏》2014年第7期，第115—116页。

④ 上海文献展览会编，《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1937年，第1页。

治各种意义以归于一治之功，实为文化事业新辟之一园地，固非徒抱残守缺，侈为观美而已。^①

包括冯永轩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因“痛感时局”而献身史地研究、特别是边疆史研究，这在叶恭绰看来，与强调“本位文化”的文献展，是一体两面的存在——都是为了救亡。

吴中文献展通过向吴中（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地区征集文献的方式进行。征集的文物包括吴中方志、史传、乡贤遗像、遗著、书法名画，及有关吴中文献之金石拓片、服御、器物，以及富有意味的革命先烈的遗物、档案——明白地昭示了文献展作为现代建国运动的底色。陈列的4159件展品，除少数为公立图书馆所藏，绝大多数为私人收藏品，不乏三代铜器、宋元古籍、宋元明清各家书画精品，也有明清以来竹、木、牙、玉各式精雕摆件。

30年代文献展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突破性：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界限，是文献与器物博览的结合，因此从“浙江文献展”、“吴中文献展”的国立图书馆主导过渡到“上海文献展”的国立博物馆主导，并无睽违。另一方面，它以大规模征集私人收藏为源泉，翻转了中国社会公与私的关系。这两点的形成，都有值得解读的历史意蕴，尤其需要放置在二战前夜中去探讨。

在救亡与启蒙的二元叙述下，遮蔽的是保守主义作为救亡运动的强劲崛起，这一脉络值得在今天重新检阅。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作为启蒙，以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式出现，正是30年代的国家主流。

（二）1937年：世界博览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博物”在文献展中的出现，其实可视为对1937年世界博览会的回应，特别是3月开幕的日本名古屋泛太平洋博览会，以及5月开幕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它们在1937年的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回响。

^① 陈凌，《他乡变故乡——从“上海文献展览会”看上海市民归属感的形成》，《都会遗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集刊》2015年第3期，学林出版社，第47页。